

## 論《文選》錄陶淵明詩文之文學史意義\*

黃旭耀\*\*

### 摘要

歷來對陶淵明於南朝的研究多不深究時人對其文學地位的看法，或僅用「冷落」之類的形容詞簡單帶過，或強調當時並不重視陶淵明的文人身分，只把他當作風教意義下的道德範式。這樣的說法顯然未將陶淵明置入《文選》之選學視角加以觀察探析，也忽視了南朝陶學及文選學研究的脈絡。本文擬就昭明太子蕭統（可代表《文選》選輯立場）所撰寫的〈文選序〉及〈陶淵明集序〉對照《文選》輯錄的陶淵明作品，再參酌南朝時期之相關資料和《文選》其他選篇以補充說明、強化論證，分析陶淵明為《文選》收錄的原因（亦即《文選》之選學視角下的陶淵明），以此管窺並試圖拼湊、補充南朝對於陶淵明文學地位的可能看法。

關鍵字：陶淵明、蕭統、《文選》、南朝陶學

---

\* 感謝匿名審查人及特約討論人之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學生。



## 一、前言

昭明太子蕭統為陶淵明編選詩文集，更為之作傳、寫序，堪稱其異代知音。並且在注重字句駢儷、聲色藻繪等形式美感的六朝，《文選》選錄了陶淵明這般「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sup>1</sup>的作品，很顯然蕭統已意識到淵明在靡麗時代的獨特性。雖然如此，但蕭統為陶淵明編集、作傳與《文選》選錄陶淵明詩文間還是存在著一則難以解釋的扞格：《文選》只選錄了陶淵明的八詩一文，相比陸機、謝靈運、江淹……等作家陶淵明實在無法望其項背，對於這個問題學界亦持不同看法。

按照張夢珂〈蕭統評陶淵明三十年研究述評〉<sup>2</sup>對學界相異見解的梳理謹分為五類：「選陶詩者（本文筆者案：指《文選》）另有其人」、「二者（本文筆者案：指《文選》與《陶淵明集》之結集時間）非在同一時期」、「文學價值取向不同」、「主觀與客觀之差異」、「二者之間並無矛盾」，前二類張夢珂已於文中提出質疑，本文且按下不表。持「文學價值取向不同」之論者將《文選》的文學價值取向化約為「娛樂」、「審美」，而《陶淵明集》為「鑒識」、「風教」。然而《文選》終究還是選錄了陶淵明的作品，顯見蕭統對二者的文學價值取向並無法斷然劃分，並且許多學者在談及《文選》選錄標準時皆提到辭采（審美價值）固然是其選錄標準之一，卻非唯一，因為風格雅正亦是其重要的選文指標；<sup>3</sup>持「主觀與客觀之差異」之論者如曹旭將《文選》視為蕭統對文壇的客觀意見，《陶淵明集》為其主觀喜好，這個說法在處理蕭統為陶淵明編集與《文選》選錄少量陶作的落差時便認為「要把陶淵明一下子就拔擢到第一流的詩人之列，不是不為，乃是不能。即使這麼做了，也不會得到社會同意的。」，<sup>4</sup>編輯《文選》仍需顧及客觀公論，因此蕭統未敢完全就個人品味定奪。

筆者認同此說，嘗試著將這個說法反過來思考：《文選》在顧及客觀公論的情形下，選錄了少量的陶淵明詩文有何特殊意義？遂成為本文欲往下開展思索的起點，後文將詳細論述。持「二者之間並無矛盾」之論者中，齊益壽走出學界主張二者相異之路線，另闢蹊徑地認為其實蕭統編輯《陶淵明集》是欣賞其作的感

<sup>1</sup> [南朝梁] 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00。

<sup>2</sup> 張夢珂：〈蕭統評陶淵明三十年研究述評〉，《天中學刊》第33卷第3期（2018年6月），頁89-90。

<sup>3</sup> 詳細可參王運熙：〈《文選》選錄作品的範圍和標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88年），頁16。以及齊益壽：〈蕭統評陶與《文選》選陶〉，《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頁318-319。

<sup>4</sup> 曹旭：〈品語發微之二——鍾嶸、二蕭與陶詩顯晦〉，《詩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99。

染力，進而具有潛移默化、有助風教的作用，但並非高度推崇其藝術造詣，因此蕭統為陶淵明編選詩文集、作傳、寫序，《文選》卻只選錄了少量的淵明作品便不成問題。<sup>5</sup>但假若蕭統並未高度推崇其藝術造詣，何以要讓與時代文學潮流相左的陶淵明從歷代浩如煙海的作家中脫穎而出，被評選為歷久不衰、可供莘莘學子精進的寫作範式？畢竟蕭統等編輯《文選》乃出於「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緝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之原因，依照這個編輯初衷的理路參以後代「選學」觀點，可推論進入選本幾乎能與成為經典畫上等號。<sup>6</sup>並且在當時文壇風尚華麗的情形下，於重要文學選本中選錄陶淵明的作品更為之另外編集、作傳，其實也就等於肯定並賦予他文學地位了。

針對大批文學作品進行編選收錄，雖然無法明瞭逐篇入選的原因，但透過「選錄」表彰褒賞之意，「略錄」暗示選家貶棄之心，以「選」寓褒貶的確是中國古代文人常見的批評方式，其影響力不容小覷。<sup>7</sup>由此脈絡可知，《文選》所收錄的作品便是編輯者認為該作家得以名垂青史之「清英」。再以蕭統曾編《陶淵明集》，可想見其對於淵明作品應是爛熟於胸，在這個前提下可推測《文選》所錄之淵明詩文乃其精華之最。而蕭統究竟如何在不違背彼時主流文學價值之理解框架，掘發並容受陶淵明作品的疏異性（strangeness），<sup>8</sup>從而使這批精華詩文可與主流作家一同進入《文選》的經典序列中？此外，近一步探討蕭統在反映主流文壇的價值觀與掘發陶作疏異性之間的權衡，對於六朝文壇有何意義？這便是本文試圖調整、延伸前人對蕭統編輯《文選》及《陶淵明集》持「主觀與客觀之差異」的觀點，從而欲深究、開展之課題。

<sup>5</sup> 詳細參見齊益壽：〈蕭統評陶與《文選》選陶〉，《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 295-322。

<sup>6</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頁 1。

<sup>7</sup> 王瑤先生曾言：「過去的讀者和作者不重視或不接受批評的指導（本論文筆者案：指『詩文評專書』），就影響上來考察，對讀者和作者發生『文學批評』的實際效果的，倒是『總集』；那作用和影響是遠超過詩話之類的書籍的。……特別是詩品，到明清才有人注意。但作為總集的昭明文選就不同了，從蕭該曹憲到唐朝的李善許淹公孫羅諸人，成立了所謂『選學』，以後不只每代都有研究的人，而且作者和讀者所受的影響也是極其巨大的。」，詳參王瑤：〈中國文學批評與總集〉，《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問題》（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 46。

<sup>8</sup>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是什麼將作者與其作品推上正典之階的？答案通常都會指向某種疏異性（strangeness）……當你第一次閱讀某正典作品時，你遇見的是一個陌生人，你得到的是一種詭譎的驚奇感而非期望的實現。……它們（本論文筆者案：指『正典作品』）所共同煥發出來的是一種詭譎之奇，能教你在熟悉的境域中生出一種疏異感。」，詳參哈洛·卜倫著，曾麗玲校訂，高志仁譯：《西方正典》（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頁 4-5。

## 二、立意為宗：諷諭、褒贊——有助風教

由上述前言可了解選錄本身對作者已是稱頌之舉，然而「選了哪些作品」又是另一個課題。選家既已承認被選錄者為經典，而透過選錄作品的方式，由作家浩瀚的全集中提煉出一部分精華，亦塑造了該位作家的形象，這無疑更延伸觸及到「接受論」的議題。

《文選》所收錄淵明的八詩一文分類雖不盡相同，但詩作所蘊含的內在精神主題大多指向了「歸去」、「歸隱」，自沈約將陶淵明歸入《宋書·隱逸傳》中，「隱逸」遂成為其重要形象之一，《文選》收錄淵明「隱逸」主題之詩文無疑強化此形象的傳播。但這並不表示淵明只有「隱逸」這個面向，也不表示淵明只有「隱逸」主題的好作品，而是在選家編選時認為陶淵明「隱逸」這類的作品才是「清英」、值得後世學習。而為何選家如此認為呢？這必須深究〈文選序〉以及〈陶淵明集序〉才能釐清。

〈文選序〉在梳理「文籍生成」的歷史後，引錄了《周易》中〈賁卦〉彖傳的句子：「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sup>9</sup>可見在《文選》編纂的理路中「人文化成」也是其肯認的重點之一。這個重點延續到〈文選序〉論及詩的部分，其引用《詩經·周南》首末篇〈關雎〉、〈麟趾〉作為「正始之道著」<sup>10</sup>的範例，再以「桑間濮上」<sup>11</sup>這等來自衛國的靡靡之音作為「亡國之音表」。<sup>12</sup>〈文選序〉言明《詩經》中正反兩端的代表後說：「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sup>13</sup>這表示《詩經》揭示了明顯的道理讓人們去依循，並且若扣合〈毛詩序〉原文對讀，或可與廣泛讀者群中的當權上位者對話。〈文選序〉除了化引〈毛詩序〉的句子：「詩者，志之所之也。」、<sup>14</sup>「情動於中，而形於言。」<sup>15</sup>認為詩有吟詠情志的功能外，亦將詩標誌上「諷諭」之功能。根據〈文選序〉的脈絡，詩自炎漢中葉之後，厥塗漸異，然而相異的是四言和五言之形式，精神上仍有可呼應處，「退傅有在鄒之作」<sup>16</sup>中的退傅指的是韋孟，韋孟年老退隱後寫了〈在鄒詩〉抒發處江湖之遠則思其君的情懷，表明尊仲尼、崇禮義的心

<sup>9</sup>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據阮刻本校刊），卷3〈賁卦〉，頁9。

<sup>10</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

<sup>11</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

<sup>12</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

<sup>13</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

<sup>14</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據阮刻本校刊），卷1，頁3。

<sup>15</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據阮刻本校刊），卷1，頁3。

<sup>16</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

志。這看似無害的敘述背後隱藏了一則關鍵的本事，韋孟退隱之因只是年老而辭別官場嗎？翻閱《漢書·韋賢傳》便可得知原因並沒有這麼簡單：

……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鄆，又作一篇。<sup>17</sup>

在《漢書·韋賢傳》引韋孟所作〈諫詩〉、〈在鄆詩〉前的這段文字隱微地透露了韋孟之創作動機與楚國王室成員「荒淫不遵道」相關，於是〈在鄆詩〉當中尊仲尼、崇禮義的敘述便成了在野的韋孟對在位君王的諷諭，希望能夠匡正其言行，可奈後來孫王戊與吳王劉濞等七國劉姓諸侯通謀作亂，次年事敗自戕。《文心雕龍·明詩》中提到「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sup>18</sup>再次證明「退傅有在鄆之作」具有匡諫的諷喻功能，並遙接周代采詩「下以風刺上」<sup>19</sup>的傳統。

「降將著河梁之篇」<sup>20</sup>一句提到李陵〈與蘇武〉的句子「攜手上河梁」，<sup>21</sup>〈雜詩上·與蘇武〉三首詩欲形塑的寫作背景都是李陵蘇武泣別的畫面，二人泣別乃因李陵被匈奴招降後幾年，匈奴與漢朝關係趨緩，蘇武得歸漢，李陵設宴辭別。

〈雜詩上·與蘇武〉最末句「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sup>22</sup>說明李陵投降後仍然以德自勉，加上司馬遷於《史記·李將軍列傳》最後給予「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sup>23</sup>的高度評價亦可旁證李陵的人品高潔。如若我們搭配《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李陵奮戰至投降的過程一併閱讀，或許就能夠將〈雜詩上·與蘇武〉與諷諭精神聯繫上關係，因為李陵至死不渝的高風亮節，正是諷諭上位者疏於明察事實作出的錯誤決定，導致漢朝痛失忠心良將最嚴厲的批判。<sup>24</sup>

<sup>17</sup> [東漢]班固：〈韋賢傳〉，《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景祐刊本景印之百衲本），卷73。

<sup>18</sup>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明詩〉，《文心雕龍注》（上海：開明書店，1947年，依照黃叔琳為底本參校他書），卷2，頁1。

<sup>19</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1，頁7。

<sup>20</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

<sup>21</sup> [西漢]李陵：〈與蘇武〉，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29〈雜詩上〉，頁421。

<sup>22</sup> [西漢]李陵：〈與蘇武〉，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29〈雜詩上〉，頁421。

<sup>23</sup> [西漢]司馬遷：〈李將軍列傳〉，《史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上海涵芬樓影印南宋黃善夫刻本），卷109。

<sup>24</sup> 《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李陵實在是到了山窮水盡、後無照應的末路才迫不得已投降。此外，根據《漢書·李廣蘇建傳》所載司馬遷之說「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李陵投降或許亦有留得青山在、更謀後事之想，然而漢武帝聽從群臣罪陵之說，族殺李陵家人，更將為李陵說情的司馬遷處以腐刑。此事李陵得知後痛心疾首，自認無愧漢家，卻因上位者誤會其為匈奴練兵（實乃李

站在諷諭的觀點詮釋，便不難理解為何《文選序》前頭會提到「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憇。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sup>25</sup>屈原亦是被佞臣進讒言所害而遭流放，最後落得懷沙自沉、以死明志的下場，「騷人之文，自茲而作」<sup>26</sup>一句可見《文選序》將騷體的源頭亦歸諸於對上位者沉痛的「諷諭」。

從上所述可見《文選序》主要的詩史論述中「諷諭」乃一大重點，此外的另一個詩史論述重點便是「游揚德業，褒贊成功」<sup>27</sup>的歌頌文體，並以尹吉甫歌頌周宣王早年復興國力的「穆若之談」，<sup>28</sup>和季札出使魯國觀樂所興發的「至矣之歎」<sup>29</sup>作為例子，貫通這兩個例子的精神即「盛美之德」，前者因上位者任用賢臣，並以德佐治，一時挽救了周王室衰微的態勢，而享有「宣王中興」的美譽，尹吉甫便是在這個背景下讚歎宣王「穆如清風」。後者季札觀樂之故事與《禮記·樂記》所揭示「音與政通」的觀念一脈相承，認為音樂有風教作用，因此觀樂給予的批評亦以風教觀為準則，於是最後歌頌獲季札「至矣哉！」之歎的詳細評語是：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滯，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sup>30</sup>

這樣的評語顯然已不再只是純粹針對音色悅耳與否進行評判，反而將音色與君子的德行互文比擬，完全符合儒家中庸之道的精神，因此對於音樂（頌）的最高評價並不是樂音如何美妙動人，而是比德於君子，以君子的德行作為觀樂的評價的標準。由此可覩《文選序》詩史論述中兩個重要的核心：「諷諭」與「褒揚」看似斷然二分的觀念，實則一體兩面。君王有誤失德，便透過詩的「諷諭功能」刺上，使其引以為戒；而君王有所為時，便透過詩的「褒揚功能」來揄揚其德業。《文選》的詩史論述包含了〈風〉、〈雅〉、〈頌〉，〈風〉、〈雅〉與「諷諭」

緒為之）之事而被誅族，後不願歸漢再受屈辱。在這個背景下李陵、蘇武泣別故事的厚度便豐富了起來，蘇武即將歸去李陵曾經為其忠心不貳、出生入死的漢邦，但也是羞辱其最深的漢朝，心中自是百感交集。史書原文詳參〔西漢〕司馬遷：《李將軍列傳》，《史記》，卷 109。以及〔東漢〕班固：《李廣蘇建傳》，《漢書》，卷 54。

<sup>25</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1。

<sup>26</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1。

<sup>27</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1。

<sup>28</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1。

<sup>29</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1。

<sup>30</sup> 〔東周〕左丘明著，〔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襄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卷 39，頁 1268。

相關，〈頌〉則與「褒揚」有關，「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sup>31</sup>又連繫上了詩與賦的關係，班固〈兩都賦序〉所說「賦者，古詩之流也。」<sup>32</sup>與此一脈相承，並且其於論述賦體特色時亦融通「諷諭」與「褒揚」的概念：「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sup>33</sup>《文選》裡收錄了〈兩都賦序〉，二者之詩史論述又有相似處，可想見《文選》編選者選詩的標準與「諷諭」、「褒揚」及二者所帶出的風教觀有一定程度上的關係。

作為《文選》最重要的編選者，昭明太子蕭統在其為《陶淵明集》所作的序文中亦流露出諷諭的色彩：

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sup>34</sup>

蕭統先肯定了陶淵明的詩文如白璧一般價值連城，而後也挑揀出其中的瑕疵，認為〈閑情賦〉是其作品中的污點，甚至是可以不必寫出來的敗筆！如此嚴厲的指控乃出於此篇「卒無諷諫」之因，縱使這個觀點引來蘇軾「淵明〈閑情賦〉（原誤），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sup>35</sup>的反對意見，但由這則資料可再次說明「諷諫」、「諷諭」所帶出的「風教觀」實在是蕭統的閱讀審視標準中離不開的重要旋律，可推測陶淵明被選錄於《文選》的詩文自然也難以完全無涉於此標準。

然而詳細閱讀〈陶淵明集序〉又可發現其中的「風教觀」似乎並不純粹是儒家語境下的產物，更參雜了道家色彩。所以在〈陶淵明集序〉前半引用了許多老莊的典故如「含德之至」<sup>36</sup>化用於《道德經》，「莊周垂釣於濠」<sup>37</sup>（這個說法應是結合了莊子與惠施的「濠梁之辯」及「莊子釣於濮水」的故事而成）、「譬彼鴛鴦，豈競鳶鳩之肉」<sup>38</sup>的本事與莊子相關……。於是「聖人韜光，賢人遁世」<sup>39</sup>中的「聖人」可看作道家遁世無為的表現，亦可以儒家的角度切入解釋為「用

<sup>31</sup> [南朝梁] 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

<sup>32</sup> [東漢] 班固：〈兩都賦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1〈京都上〉，頁21。

<sup>33</sup> [東漢] 班固：〈兩都賦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1〈京都上〉，頁21-22。

<sup>34</sup> [南朝梁] 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200。

<sup>35</sup> [元] 陳秀明編：《東坡文談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3。

<sup>36</sup> [南朝梁] 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199。

<sup>37</sup> [南朝梁] 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199。

<sup>38</sup> [南朝梁] 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200。

<sup>39</sup> [南朝梁] 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199。

之則行，舍之則藏」<sup>40</sup>的「天地閉，賢人隱」<sup>41</sup>之說。

由這條詮釋進路觀察，筆者以為若將〈陶淵明集序〉置入魏晉南北朝「儒道會通」的思想史背景下，其闡釋內涵將更為豐富多元，並且亦可視為詮釋《文選》收錄陶淵明「隱逸主題」的詩文，卻又不錄之於「招隱」一類之緣由。因為陶淵明的隱逸不只是小隱隱陵藪，更有超脫而高深的道德境界，而這樣高蹈之風範便是蕭統所代表的《文選》編選者認為陶淵明詩文最有價值、可供後世效仿之處。

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sup>42</sup>

從這段序文的結語可以觀察到蕭統在看待陶淵明的詩文時，十分強調其作「有助風教」的功能性，並且這個功能性雜揉了儒、道思想，所以閱讀淵明詩文可以同時實踐儒家的仁義，又不必遠求於太華山便能習得道家聖人的韜光、遁世之方，可謂「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從《文選》所選的陶淵明詩作亦可映照上述蕭統在〈陶淵明集序〉所言「風教觀」融合儒道思想的現象，以〈行旅上·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為例：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  
眇眇孤舟遊，緜緜歸思紺。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  
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sup>43</sup>

雖然前頭已指出《文選》所收錄淵明之作其內在精神主題大多與「歸去」、「歸隱」相關，「隱逸」亦隨之成為陶淵明的重要形象之一，然陶淵明高蹈獨善的「歸去」並不只是一個輕飄飄的標籤，而是艱辛地從紛亂的現實人世一點一滴淬鍊出來的。從〈行旅上·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可看出陶淵明雖然安於事外恬淡貧窮的生活，但在碰到了應當承擔重任的時機，他仍然願意「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展開勞碌奔波的旅程，並由此昇華出「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的高度境界。雖然奔忙於可怖的亂世中，卻不畏受外在拘束而

<sup>40</sup> [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卷4〈述而〉，頁88。

<sup>41</sup>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卷1〈上經乾傳〉，頁16。

<sup>42</sup> [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200-201。

<sup>43</sup> [東晉]陶潛：〈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26〈行旅上〉，頁384。

改變自己，因為心中時以自然、山澤為念便不怕忘了自己的初衷，也就一定能夠再回到班固〈幽通賦〉所言：「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sup>44</sup>的真美境地。按照逯欽立的說法，〈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詩作於元興三年，因桓玄篡位，劉裕行鎮軍將軍與其他有志之士等舉義討伐之，陶淵明亦赴義，此詩便是寫於這個時代背景下。<sup>45</sup>《文選》所錄另一首淵明的行旅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據逯欽立的考訂乃作於隆安五年，此外逯欽立更應和朱自清「淵明之行在五年，疑其嘗為桓玄仕也」<sup>46</sup>的推論。若其考據無誤，淵明能夠為是非大義而赴義反對前東家的行徑，就更加凸顯他懷抱儒家積極淑世的精神向度。然而外在世局之混亂，淵明未嘗改易其內在「真想」，因此不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或〈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都提到了「歸去隱逸」之心志，這與道家「無為」的處世態度不謀而合。儒家向外努力，道家向內修持，陶淵明的表現不失為融通「內聖」與「外王」的一種詮釋。李善在注解班固「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一句時化引了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sup>47</sup>再直引孔子曰：「里仁為美」，<sup>48</sup>此亦可旁證陶淵明最終欲歸返的「班生廬」所蘊精神與儒道脫離不了干係。

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的「聖人」之說兼雜儒道，最後收攝於風教，遙相與〈文選序〉的選錄標準相映旁通，亦可說明《文選》中所錄之陶淵明詩文除了多具隱逸主題的共性外，還潛藏著與〈毛詩序〉一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sup>49</sup>「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sup>50</sup>的風教觀。不論時代如何紛亂，淵明終究不曾改變己志，所以能夠做到「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sup>51</sup>這般會通儒道精神的境界，《文選》編選者亦為這樣的處世態度動容，於是收錄了顏延之為陶淵明所作的誄文，按〈文選序〉言：「美終則誄發」，<sup>52</sup>而〈陶徵士誄〉也是「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成果，可推知《文選》編選者認同陶淵明之美德及其處世態度，並認為應該流佈供後人學習，因為這也是「兼功」的環節之一。雖然學界普遍認為《文選》依倚儒家立場，但筆者認為《文選》選錄陶

<sup>44</sup> 〔東漢〕班固：〈幽通賦〉，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14〈志上〉，頁 213。

<sup>45</sup> 逯欽立：〈陶淵明年譜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8 年 6 月），頁 235。

<sup>46</sup> 逯欽立：〈陶淵明年譜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8 年 6 月），頁 233。

<sup>47</sup> 莊子原文為「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卷 8 下〈則陽〉，頁 878。

<sup>48</sup> 〔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 2〈里仁〉，頁 44。

<sup>49</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1，頁 5。

<sup>50</sup> 同前註，頁 7。

<sup>51</sup> 蘇軾評淵明語，參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書李簡夫詩集後》，《蘇軾文集》，卷 68〈題跋〉，頁 2148。

<sup>52</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1。

淵明會通儒道之詩文的關鍵意義在於：陶淵明身處玄風大盛的江左文壇中，卻能夠書寫出不流俗的風格。

睽諸劉勰、<sup>53</sup>鍾嶸、<sup>54</sup>沈約<sup>55</sup>梳理詩史時對於玄言詩的批評，便可管窺時人之微詞，甚至有研究者直接目之為「詩歌國度最黑暗的時期」。<sup>56</sup>而《文選》也並未收錄東晉最具代表性的玄言詩作品，可推論其應當贊同時人的批評。在這個脈絡下觀察蕭統評論陶淵明的句子會通了儒道思想，似乎便有與前代文學史對話之感，認為陶淵明不像當時玄言詩一般耽溺於老莊學說，反而發揚了老莊精神裡積極「內聖」的面向，因此往儒家靠近而有助於風教。然淵明雖異於東晉流行的玄言詩，但他也並未同於下一波以謝靈運等為首的文學流行風潮，所以無法成為《文選》之首選作家。不過淵明仍是《文選》認為後世學子應當學習的風範，故折衷以少量收錄，兼顧主客觀立場。

### 三、能文為本：綜緝辭采、錯比文華

由前述梳理已知《文選》選錄的陶淵明詩文多有隱逸主題的共性，同時這個主題能夠拔高境界帶出有助風教的宗旨（有別於玄言詩）。然而境界超然彰顯風教的意旨並非陶淵明詩文得以躋身《文選》收錄範疇的唯一標準，除此之外「能文」亦是其選錄篇章的一大重點。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sup>57</sup>

<sup>53</sup> 〔南朝梁〕劉勰：「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遁遷，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參見：〔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時序〉，《文心雕龍注》，卷9，頁24。

<sup>54</sup> 〔南朝梁〕鍾嶸：「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參見〔南朝梁〕鍾嶸著，曹旭注：〈詩品序〉，《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4。

<sup>55</sup> 〔南朝梁〕沈約：「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參見：〔南朝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列傳》（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卷67，頁1778。

<sup>56</sup> 詳見羅志仲：《《文選》詩收錄尺度探微》（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頁119。

<sup>57</sup> 〔南朝梁〕蕭統：〈文選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1-2。

〈文選序〉在這段中透露了選文的另一個標準：「能文」，這裡的「能文」指的是否是變本加厲的藻飾呢？我們可以透過《文選》編選者對於史書中論贊的收錄意見推敲：「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便是《文選》編選者對於「能文」的補充詮釋，「能文」固然有強調藻飾的部分，但在搭配著「事出於沉思」之立意考量下（可與前述的另一則選錄標準：「有助風教」相互對照），「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遂成了《文選》中和平衡的審美觀，而「能文」便不至於淪為過度的「鋪衍侈麗」。這樣的審美觀點亦頗可與揚雄《法言·吾子》所提出之「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sup>58</sup>一說相互對照。另外，許多學者以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裡頭「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sup>59</sup>說明蕭統「文質彬彬」的文學觀與永明文學有別，<sup>60</sup>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更引錄《梁書·何遜傳》的資料說明蕭統所招集的《文選》編選者們多有「麗則」的文學審美觀，<sup>61</sup>再次說明《文選》的「能文」應是「中和平衡」而非過度的「鋪衍侈麗」。這也就呼應了前言所述許多學者並不認為辭采、翰藻（審美價值）為《文選》選錄的唯一標準，因為風格雅正亦是其不可忽略的重要選文指標。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愴。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sup>62</sup>

上述鍾嶸在《詩品》中對於陶淵明的批評亦頗可與《文選》選錄陶淵明詩文的原因參照互讀，並且「懽言醉春酒」（〈讀山海經〉）、「日暮天無雲」（〈擬古詩〉）二摘句所源出之篇章亦被《文選》收錄於「雜詩」和「雜擬」兩類當中，兩部巨著關注陶淵明的切入角度不約而同。此外，鍾嶸《詩品》在一連串評定為「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sup>63</sup>的經典範例名單中提到了「陶公詠貧之制」，《文選》「雜詩」一類中亦收錄了陶淵明的〈詠貧士〉，再次證明《文選》和《詩品》關注陶淵明詩文時趨近的審美觀點。並且二者審視陶

<sup>58</sup> [西漢]揚雄：〈吾子〉，《法言》（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據江都秦氏本校刊），卷2，頁1。

<sup>59</sup> [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昭明太子集校注》，頁155。

<sup>60</sup> 詳細參見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74。周勛初亦將「文質並重」視為蕭統的文學觀，語見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1。

<sup>61</sup> 詳細可參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中華文史論叢》第5輯（1964年6月），頁208。

<sup>62</sup>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注：〈詩品中·宋徵士陶潛詩〉，《詩品集注》，頁260。

<sup>63</sup>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注：〈詩品下〉，《詩品集注》，頁347。

淵明的美學角度都兼具「文」、「質」並重的觀點，所以相互參酌的價值便更別具意義。上述鍾嶸在《詩品》中評論陶淵明的敘述亦可幫助我們破解本章節的難題——如何以「能文為本」、「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的編選理念闡釋陶淵明被《文選》選錄的作品？當我們看到「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愒。」或是顏延之〈陶徵士誄〉「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sup>64</sup>等說法大概很難與「綜緝辭采、錯比文華」這樣的句子連結，但在相似的語境脈絡下鍾嶸以「懽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二句淵明詩摘為例說明其作品特色乃「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風華清靡」按照王叔岷的說法可視為「華靡」，其義更與「華美」、「美贍」大致相似，<sup>65</sup>照此說陶淵明的寫作特色就能與《文選》所提出「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的立場聯繫起關係了。朱曉海〈讀《文選·序》〉對於「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亦有獨到且一語中的之見，其運用《易》學術語「綜」、「錯」交錯對待的概念闡釋「綜緝辭采、錯比文華」，指出透過對華、采、文、辭組合安排，令讀者通讀全篇有無比新巧變化之感，便是其義之一。<sup>66</sup>此外朱曉海更引錄陸機〈文賦〉的句子對「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加以申義，且引〈文賦〉句於下說明：

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  
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

67

朱曉海認為「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中「沉」、「翰」相對乃典出於陸機〈文賦〉此句，並認為陸機此言意在說明「創作的初期過程，如何釐清自己的感受，並如何用恰當的語彙捕捉這分飄渺模糊的感受，使得自己確定自己要表達的是什麼。」<sup>68</sup>由此可知「藻飾」一詞除了用字華美之義以外，其實詩人將「志之所之」、「情動於中」有意識地轉化，「形於言」的過程本身就是藻飾、雕琢了。回到《詩品》所言「豈直為田家語耶？」當中「豈直為」三字相當值得探究，根據語法學的觀念，疑問性副詞加肯定表否定，於是此句解為「不直為田家語」，也就是說陶淵明的作品並不是直敘記錄觸目所及，也非毫無修飾就將心中所想直

<sup>64</sup> [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57 〈誄下〉，頁 806。

<sup>65</sup> 詳細參見王叔岷：〈鍾嶸《詩品》概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 期（1991 年 3 月），頁 20。

<sup>66</sup> 詳細可參見朱曉海：〈讀《文選·序》〉，《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21 輯（2003 年 12 月），頁 118。

<sup>67</sup> [西晉]陸機：〈文賦〉，《陸士衡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據小萬樓叢書本排印），卷 1，頁 1。

<sup>68</sup> 朱曉海：〈讀《文選·序》〉，頁 119。

言托出，其間還經過淵明匠心獨運的轉化過程，以〈擬古詩〉為例：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  
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sup>69</sup>

元代劉履對陶淵明〈擬古詩〉這批作品就曾下過一則總評：「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目名其題云。」<sup>70</sup>這則評語除了可以扣合前述《文選》選錄標準的風教諷諭觀，又帶出：淵明沒有用激烈的口吻表達悼國傷時的心情，反而以委婉的方式幽微呈現，透過意象經營、藉物起興，以麗景襯哀情，說明「榮樂不常」的意旨，寄寓板蕩亂世的傷感，達到諷諭之目的。若參照《文心雕龍·比興》，這也許就是「興之託諭，婉而成章……」<sup>71</sup>的實際作法，劉履將陶淵明〈擬古詩〉的每一個意象所象徵之本事詳細系聯出來，<sup>72</sup>可推想「興」便是淵明將觸目所及、心中所想轉化為筆下行文託諷的中間過程。這樣的過程亦可與〈毛詩序〉說明詩之諷諭觀後，所提出的「主文而譎諫」<sup>73</sup>相互對照，「主文而譎諫」中的「譎」就有「變化」之義，可覘古來對諷諭的作法也是經過下位者轉化後才呈予上位者，亦非直接言明。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sup>74</sup>

「酒」是蕭統搜校淵明詩文時最常見的意象，並且認為這絕非只是淵明貪杯嗜酒之故，「酒」這個意象背後反而別有深意，蕭統解釋此乃「寄酒為迹」的行徑。而何以淵明需要「寄酒為迹」、歸田園居？在蕭統的認知裡頭，正是因為其

<sup>69</sup> 〔東晉〕陶潛：〈擬古詩〉，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30〈雜擬上〉，頁 445。

<sup>70</sup> 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20。

<sup>71</sup>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比興〉，《文心雕龍注》，卷 8，頁 1。

<sup>72</sup> 劉履曰：「『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遇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之讖，而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於懷，譬猶雲間之月，行將掩蔽，葉中之華，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為憫悼之意，不其深歟？」，語見前註頁 237。

<sup>73</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1，頁 7。

<sup>74</sup> 〔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 200。

不願意「折腰向鄉里小兒」<sup>75</sup>以及「耻復屈身後代」。<sup>76</sup>此外，「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一句似乎也可說明蕭統認為陶淵明的詩文有指涉時事之處，下半句又帶出其曠真之胸懷，將此句與淵明歸去之本事對讀，便可發現「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sup>77</sup>固然是其永恆的理想追求，卻也是在惡劣的政治動蕩下不得不的選擇。於是在蕭統的理解中，淵明的歸隱田園之詩所經營的意象能夠達到「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背後都隱約含有時代、政治的影子。

按這條線索繼續追探，《文選》所收錄的九首陶淵明詩文當中「飛鳥」更是另一個十分常見的意象（可見於六篇），「飛鳥」意象所置放的語境也和歸去之隱逸主題相關，「飛鳥」有時代表歸去隱逸的自然中無憂無慮的象徵（〈行旅上·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雜詩下·雜詩〉二首、〈雜詩下·讀山海經〉），有時以「飛鳥」喻己歸去（〈雜詩下·詠貧士〉、〈辭·歸去來〉），在〈雜詩下·詠貧士〉中詩人更是分出「眾鳥」與「遲遲出林翩」，劉履便將「眾鳥群飛」解為諸臣趨附，而將遲出早歸的那隻孤鳥視作淵明自況。<sup>78</sup>陶淵明欲歸去隱逸，除了緣於高蹈獨善的超然心境外，時代氛圍亦乃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陶徵士誄〉所提到陶淵明予顏延之的警惕及顏延之的贊同便是很好的佐證：「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眾速尤，迕風先靡。」，<sup>79</sup>可推測淵明不願同時代之流而「違己」，最後落得「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的下場，這或許也是淵明自況為遲出早歸之孤鳥的原因之一。

由上述可覘《文選》陶淵明詩文欲抒發內心對時代亂象之感，並進行幽微的諷刺時，都經歷了「興」的過程，鍾嶸對陶淵明的評價：「篤意真古，辭興婉愴」，便為這個過程下了註腳，因為並非逕行批評，因此委婉恰當，並且這樣的作法又遙接〈毛詩序〉所揭示「主文而諭諫」的諷喻傳統。由此可知陶淵明「文體省淨，殆無長語。」、「文取指達」的寫作特色都是詩人匠心獨運的成果，詩人內心念想與詩文創作之間是經過轉化過程的，這也就是《詩品》為何給予其作品「風華清靡」的一錘定音，以及陶淵明何以能夠符合《文選》「能文為本」、「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以及「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選錄標準，最後獲編選者賞

<sup>75</sup> [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傳〉，《昭明太子集校注》，頁192。

<sup>76</sup> [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傳〉，《昭明太子集校注》，頁193。

<sup>77</sup> [東晉]陶潛：〈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26〈行旅上〉，頁384。

<sup>78</sup> 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267。

<sup>79</sup> [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57〈誄下〉，頁808。

識進而入選其中。<sup>80</sup>

鍾嶸與蕭統先後為陶淵明在《宋書》「隱逸傳」僅強調「既定社會角色中的表現，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道德教化意義」<sup>81</sup>的框架中注入文學的元素，一如曹旭所言「鍾嶸《詩品》評陶詩的意義在於：第一次把陶淵明從『隱逸傳』中拔擢到詩人的隊伍裏來，陶詩自此始顯。陶詩之顯，在於鍾嶸推崇的兩方面：詩品和人品」。<sup>82</sup>蕭統接續鍾嶸的步伐，於私為陶淵明編纂詩文集，於公亦讓陶淵明躋身文壇，雖然僅選錄少量淵明作品於《文選》中，但若將此置於「儼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sup>83</sup>的南朝文壇便可理解此舉已非同小可。雖然筆者不同意齊益壽所提出「由於蕭統重視文采，陶淵明的詩文因為辭采未優，故僅僅八詩一文收錄為《文選》所選錄」<sup>84</sup>之論調，但其將蕭統所謂「辭彩精拔」<sup>85</sup>解為「辭采精約、奇拔、奇特」<sup>86</sup>本文受用良多，陶淵明的奇拔、奇特正在於其辭采精約，在重視詞藻華麗的六朝，陶淵明用另一種「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的方式，透過「藉物起興」這樣「辭興婉愬」的方式來寄託心中所想，遂創造出「風華清靡」這種不過度的華美型態來，也就可以呼應蕭統等「麗則」的文學審美觀。

在南朝的文壇中，華麗雕琢之風雖為主流，但實際上文人們對華麗及其對反面未嘗沒有兩端的思索，譬如鍾嶸雖將謝靈運列為上品，但仍言其「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sup>87</sup>後來在蕭綱〈與湘東王書〉中亦表達了此觀點，田曉菲進而推論「到蕭綱的時代，優雅與節制是宮廷詩歌的理想標準」，謝靈運這般缺乏節制的文風已有過時之感。<sup>88</sup>楊明甚至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

<sup>80</sup> 葉嘉瑩在講解淵明詩時提到：「所謂『興』，不但重視作者由外物所引起的感動，同時也重視讀者在讀詩的時候由詩篇所引起的感動。我曾引了西方接受美學依塞爾（Wolfgang Iser）的說法，說作品的兩邊有兩個極點，一邊是作者，一邊是讀者，讀者的興發感動也是非常重要的。後來我又提到了一點，我說一首詩若是果然傳達出一種使人興發感動的力量，它就是成功的詩；如果不能夠傳達出這種力量，它就是失敗的詩。」，由蕭統「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的慨嘆，及其於公於私皆盡力為淵明留下紀錄（編集、作傳、寫序，以及將其選入《文選》），可知作者陶淵明的「興」成功興發了讀者蕭統感動的力量。葉嘉瑩語見其著：〈陶淵明詩淺講〉，《好詩共欣賞——陶淵明、杜甫、李商隱三家詩講錄》（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42。

<sup>81</sup> 王國瓔：〈史傳中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12 卷，2000 年 5 月，頁 227。

<sup>82</sup> 曹旭：〈品語發微之二——鍾嶸、二蕭與陶詩顯晦〉，《詩品研究》，頁 195。

<sup>83</sup>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明詩〉，《文心雕龍注》，卷 2，頁 2。

<sup>84</sup> 齊益壽：〈蕭統評陶與《文選》選陶〉，《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頁 322。

<sup>85</sup> 〔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陶淵明集序〉，《昭明太子集校注》，頁 200。

<sup>86</sup> 齊益壽：〈蕭統評陶與《文選》選陶〉，《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頁 297。

<sup>87</sup>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注：〈詩品上·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詩品集注》，頁 160。

<sup>88</sup>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22。

指出「蕭繹要求做到『豔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而有質，約而能潤』，即要求文質彬彬，與劉勰、蕭統等人所論也是一致的。」<sup>89</sup>

由此脈絡可窺見蕭統將陶淵明編入《文選》正好是文學風氣逐漸轉變的過渡時期。謝靈運於《文選》佔四十首詩，淵明詩僅佔八首，自然不能算多，但蕭統在《文選》客觀呈現文壇景況的同時，亦將「麗則」的陶淵明折衷、少量而適當地放入此重要文學選本中，作為與文壇主流相左的另一種典型，溫和徐緩地嘗試轉變文壇過度重視「文」之藻飾的風氣。這便是筆者認為何以《文選》在顧及客觀公論的情形下，仍舊選錄了陶淵明作品之緣故。這樣的說法也就化解和以蕭統為陶淵明編集、作傳，卻在《文選》僅選錄陶淵明八詩一文的扞格了。

#### 四、小結

在陶淵明歷代接受史的研究當中，學者多認為其於南朝時期是被冷落的、文學地位亦不高，<sup>90</sup>戴建業甚至推而深論，認為此時的文人如蕭統、顏延之、沈約等只知一味頌揚、敬重陶淵明的情趣與操守，卻渾然不將其當作一位詩人看待。<sup>91</sup>然而，透過本文的論析可見，此種觀點仍有商榷餘地。此種觀點輕視了蕭統接踵鍾嶸將「陶淵明從『隱逸傳』中拔擢到詩人的隊伍裏來」，<sup>92</sup>這般並未忽視其文學價值的舉措。且蕭統不僅為陶淵明編選詩文集，亦在《文選》中選錄其詩文，顯示其對提升陶淵明的評價與文學地位之努力。

透過〈文選序〉、〈陶淵明集序〉以及《文選》所選錄的淵明詩文，對照南朝文壇脈絡分析，本文歸納出《文選》的選錄標準主要包括「立意為宗：諷諭、褒贊——有助風教」與「能文為本：綜緝辭采、錯比文華」兩大特色，並藉此回應本文所提出的核心問題：「究竟陶淵明這純度極高的精華詩文如何呼應《文選》編輯者的審美角度？」。陶淵明的詩文雖然風格獨異，不似謝靈運般華美鋪陳，卻展現出精煉於意象的辭采，體現了蕭統所推崇「文質彬彬」的文學觀。

《文選》選錄陶淵明作品的文學史意義在於：儘管其作未能符合時代的審美潮流，亦未能成為南朝文學的主流典範，但作為文學風氣由過度、逸蕩逐漸轉變為優雅與節制的過渡時期代表，蕭統等人仍然獨具慧眼地將陶淵明的詩文適當地

<sup>89</sup> 楊明著：〈南朝文學批評·蕭繹〉，收王運熙、顧易生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302。

<sup>90</sup> 鍾優民認為「這個時期陶學的重要性，是怎麼估計也不算過高的」遂為此時期的陶學定為「筚路藍縷，奠基維艱」，詳見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20。李劍峰以「隱名自顯，知音其稀」化約東晉南北朝對陶淵明的接受現象頗具代表性，詳參其《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19。

<sup>91</sup> 詳參戴建業：〈由冷落到推尊——陶淵明接受片論〉，《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頁320-321。

<sup>92</sup> 曹旭：〈品語發微之二——鍾嶸、二蕭與陶詩顯晦〉，《詩品研究》，頁195。

選入了《文選》這樣重要的文學選集中，使其脫穎於「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緝帙。」這般文學史洪流，躋身經典「清英」之列。<sup>93</sup>蕭統主客觀雙管齊下地使陶淵明留名文學史，已足以說明蕭統在陶淵明被主流大眾冷落、文學地位亦不高的時代之苦心孤詣，「南朝不以淵明為文人」之論未免言之過鑿。

---

<sup>93</sup>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對「疏異性」的一段解讀頗可與陶淵明逐漸成為經典的歷程呼應：「正典的疏異性並不一定會伴隨著這種因大膽作風而引發的驚奇感，但是對任何一部在與傳統的競賽中獨佔鰲頭並躋身正典的作品而言，原創性的特殊風味必定會率先散發出來。」，詳參哈洛·卜倫著，曾麗玲校訂，高志仁譯：《西方正典》，頁 10。

## 徵引書目

### (一) 專著

- 〔東周〕左丘明著，〔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襄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
- 〔西漢〕司馬遷：《史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西漢〕揚雄：《法言》，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
- 〔東漢〕班固：《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
- 〔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 〔西晉〕陸機：《陸士衡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
-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上海：開明書店，1947年。
- 〔南朝梁〕蕭統等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 〔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元〕陳秀明編：《東坡文談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年。
- 〔清〕陶澍編：《陶淵明先生集注》，上海：中原書局，1928年。
-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 王運熙、楊明著：《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王瑤：《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問題》，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李劍峰：《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 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哈洛·卜倫著，曾麗玲校訂，高志仁譯：《西方正典》，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05 年。

曹旭：《詩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葉嘉瑩：《好詩共欣賞——陶淵明、杜甫、李商隱三家詩講錄》，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戴建業：《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 年。

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 （二）期刊論文

王叔岷：〈鍾嶸《詩品》概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 期，1991 年 3 月，頁 11-24。

王國瓊：〈史傳中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12 卷，2000 年 5 月，頁 193-228。

王運熙：〈《文選》選錄作品的範圍和標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1988 年，頁 10-16。

朱曉海：〈讀《文選·序》〉，《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21 輯，2003 年 12 月，頁 110-122。

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中華文史論叢》第 5 輯，1964 年 6 月，頁 195-221。

張夢珂：〈蕭統評陶淵明三十年研究述評〉，《天中學刊》第 33 卷第 3 期，2018 年 6 月，頁 87-92。

遂欽立：〈陶淵明年譜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8 年 6 月，頁 223-243。

## （三）學位論文

羅志仲：《《文選》詩收錄尺度探微》，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